

安徽古錢特輯

(第二輯)

安徽人民出版社

江蘇錢幣

1993

安徽錢幣

中國錢幣

刊十周年



新中國貨幣鑑定

安徽省錢幣學會

融

祝賀安徽省政府錢幣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

古為今用

李保华

一九五九年九月



序

在今年一月召开的中国钱币学会全国秘书长会议上，听了安徽钱币学会的报告，留下两个印象：一是安徽学会的作风，不搞大声张扬，哗众取宠，而是埋头实干，做脚踏实地的工作；二是安徽学会注重笔耕，从学会成立到学会工作的开展，多以会刊或文集开道，用它作为联系会员的纽带，反映学术成果的园地。安徽省钱币学会是1988年正式成立的，但早在此前几年就酝酿筹备，从1985年起，已经在《安徽金融研究》上组织发表有关钱币方面的文章，继而利用这个阵地，创办钱币增刊，作为学术和舆论的准备，也是后来创办的《安徽钱币》的前身。安徽钱币学会刚刚成立，他们又很快精选出在大会上交流的论文36篇，编纂成《钱币文论特辑》（第一辑），把学会筹备时期，安徽钱币学界的主要成果汇集在一起，既是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又是一次新高潮的动员。省学会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影响到各个地、市，现在已经成立学会的合肥、安庆、滁州、蚌埠和阜阳，几乎都有自己的会刊（或钱币专栏），作为会员交流的园地。

现在要出版的《钱币文论特辑》（第二辑），是安徽钱币学会成立五年来学术成果的总汇，也是对当今安徽钱币界学术水平的检阅。这本《钱币文论特辑》的主要特色是着力于本地区钱币的发掘和探索。这正是安徽钱币学会努力的方向。

作为楚国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钜阳（今太和县）、寿春（今寿县），均在安徽境内。解放以来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也说明安徽是楚币出土的主要区域。把楚币研究作为安徽钱币学的一个重点，是顺理成章的。这本《特辑》专门开辟“楚币研究”专栏，反映安徽在这个领域开发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完整的楚金版是由安徽六安最早发现的，人们从此才认识了金版形制的全貌。二十多年来，随着出土资料的日益丰富，对金版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从这本《特辑》所收集的论文，可以知道，现在不仅掌握了金版的几种形制，而且能够分辨出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金版具有不同的制作特征。对于楚金版的文字释读，除了注意不同的钤印文字，还注意到金版的背面、侧面，这些地方往往刻有细微的数字符号，而从这些不同的排列数字，可以推测出当时铸币的规模和数量，看到战国后期楚国用金数额的巨大。近年来，随着蚁鼻钱的大量出土，对蚁鼻钱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不仅是币面文字有诸多新品发现，而且对其字形、版别、铸造工艺和断代分析都有新的认识。此外，对楚币的文字释读、铸行区域和年代及其与金版、蚁鼻钱的货币关系等都作了有益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弄清战国楚的货币经济，以及相关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都有重要价值，为解开中国早期货币史的重要一环做出了贡献。

关于两宋钱币的研究，安徽也占有天时地理的优势。特别是安徽出土的金牌、金铤，对认识两宋金银货币有重要意义。这些金牌、金铤，具有相当规范的形式，相对标准的重量，币面戳印的内容，包涵制造地点、金银铺号、工匠姓名和黄金成色。从戳印文字和金银铺号，还可以断定它们诞生于北宋，广泛使用于南宋。另外，和州（今和县）铅牌的发现，又为南宋钱牌增添了新的门类，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宋钱方面，安徽是当时铸钱的主要地区之一，若能在铸钱遗址的现场，找到当时当地铸造的钱币，则将大有益于宋钱版式的考证。近年来，江苏高邮出土的铁钱已经引起广泛注意，而安徽滁州等地出土的铁钱，同样也是研究南宋两淮铁钱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果把陕西、四川、湖北、安徽、江苏的铁钱资料都汇总起来，作排比研究，我想一定可以从中悟出新的真谛，一定会把我国的铁钱研究引向新的深度。安徽出土的两宋钱币，丰富多采，应有尽有，金、银、铜、铁、铅，各类铸币俱全，已是难得。更有甚者，在1983年，东至县又发现一套“金银见钱关子”钞版，对此，安徽钱币学界给予了高度重视，作了大量的鉴定和研究工作，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是探索我国早期纸币的一次难得的实践。

此外，对于安徽铸钱遗址的考察及其沿革历史的探讨，对于有关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历史的研究，对于钱币学研究方向及其现实意义的讨论等等，有关论文也都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

《钱币文论特辑》已经编辑出版两辑，为读者提供了安徽近十年来在钱币学、货币史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料。如果每隔五年左右，编这样一本《钱币文论特辑》，持之以恒，那么，它不仅是安徽在钱币学、货币史领域不断进取，不断攀登的真实记录，也是为中国钱币学宝库积累了一笔珍贵的财富。相信《特辑》的出版发行，一定会对推进安徽的钱币事业，推进中国的钱币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

戴志强

1993年9月16日

前　　言

1988年我省钱币学会编辑的《钱币文论特辑》(第一辑)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广大钱币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在我省钱币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编辑了《钱币文论特辑》第二辑。本辑编入了我国著名钱币学家、本会学术顾问郭彦岗、吴筹中、蒋若是先生的重要论文和故宫博物院代院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吕济民先生,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委员会主任周世敏女士在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以飨读者。精选本省钱币专家及本会会员撰写的论文凡39篇,分成“专题研究”、“货币史研究”、“楚币研究”、“钱币论坛”、“安徽钱币出土与研究”等五个栏目,基本汇集了我省钱币学会成立五年来的优秀学术成果,反映了我省钱币研究的学术水平。中国钱币学会名誉会长李葆华同志亲自为本书作了“古为今用”的题词,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戴志强同志为本书作序,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对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安徽地处中原,是我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江淮之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铸造、发行、流散的钱币种类很多,蕴藏丰富。安徽省钱币学会成立以来,在中国钱币学会的指导下,在金融系统、文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针对安徽特点,紧紧围绕楚币、关子钞版、两淮铁钱、安徽铸钱遗址、历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革命根据地货币等重点课题,开展专题研究,进行大胆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前所未有的钱币收藏和研究热潮正在兴起,这是推动深入开展钱币学术研究的良好机遇。本书的出版,希望能成为激励我们继续进取的新起点和加油站。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省人民银行、省出版局、文博部门和广大会员的重视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关心、支持我省钱币学会的各级领导和海内外广大泉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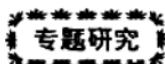
汪斌

1993年9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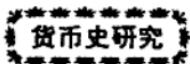
钱币文论特辑(第二辑)

目 录

- 序 戴志强(1)
前言 汪斌(4)



- 试论封建社会国家纸币的性质 郭彦岗(1)
中国纸币的研究与发展 吴纂中(7)
秦钱论 蒋若是(16)
从钱币热看钱币收藏与研究的意义 吕济民(31)
对“盛世修史”的认识 周世敏(38)
丹阳铜、梅根治、永丰监考 杨国宜 裴士京(46)
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吴兴汉(56)
方“四铢”的新发现及内涵研究 张秉伦 张振标等(75)
“施钱当𬬱”考辩 章书范(80)
试论钱币研究的方向及其现实意义 汪昌桥(92)



- 论晚清王茂荫的钱币主张 李德宣(98)
略论西汉初年铸币权的斗争 张南(105)

试论两宋货币经济高度发展和后期滞缓的原因	鲁光贤(112)
试论中唐通货紧缩的社会根源	吴剑华 沈国言(118)
吴王刘濞丹阳郡“即山铸钱”初探	张振才(129)
从“至元通行宝钞”看元代的货币制度	卢茂村(134)
从“大元通宝”雕母的发现看元代的货币制度	宋康年(143)

* * * * * 楚币研究 * * * * *

试论楚金币与楚文化的关系	汪本初(145)
卢金考	任经荣(151)
试论楚贝币面文含意	梅凌 吕长礼(156)
论楚贝币及铸贝钱范的特色	张宏明(165)
关于楚国布币文字的考释	徐明华(173)

* * * * * 钱币论坛 * * * * *

“秦半两”再议	张振才(175)
五铢钱纹分类探密	黄礼传(181)
试论“钱圜函方”兼及“国宝金匱”	吴常熊(190)
试谈“大朝金合”钱	孟滢(195)
清代银元流通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卫国(201)
论“三体钱”	张业(205)
试析南宋两淮铁钱的推行过程	章书范(208)
试论南宋两淮铁钱的铸造数量及其购买力	
	胡云英 奚风 林汉昌(214)
从南宋铁钱的出土谈川、淮两地铁钱之异同	滕晓(217)

安徽钱币出土与研究

- 从考古发现看安徽古代货币文化的几大特色 吴兴汉(220)
建国以来安徽出土古钱币述略 汪本初(239)
安庆造币述略 黄礼传(260)
浅议青阳出土的“青铜斧” 林介眉(274)
试析“青铜斧” 王律友 舒青贵(277)
元丰通宝小平母钱和样钱 吕长礼(281)
从青一色“圆国”双旗币探讨民国安徽铜元版式 李向东(287)
“安徽中国银行”早期发行的“伍元”兑换券 章安庆(292)

试论封建社会国家纸币的性质

本会学术顾问 郭彦岗

两宋以来，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封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纸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那样，“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职能中产生的，是一种用行政权力强制通行的国家纸币”。赵宋的官交子、钱引、关子和会子，金交钞，元钞，明宝钞，顺治钞贯和咸丰官票宝钞，均具有这种国家纸币的性质，而且是从铸大钱和行铁钱中演变出来的。这些纸钞是历代封建王朝为了解救财政困境，利用国家权力，由官方集中印制发行，强制民间无条件行用的国家纸币。它们具有突出的封建强制性，明显的封建依附性，严酷的封建剥削性和罪恶的封建腐朽性。中国封建经济下国家纸币的这些性质，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这种纸币诞生的理论依据，是以封建权力为中心的“货币国是说”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贯迷信其权力是威力无穷的。他们从历代钱币减重和铸行大钱的经验中，发现了铸造不足值的铸币仍然可以流通，且对封建政权有利可图，又深受管子的“货币乃先王所造”货币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可以运用所掌握的权力，任意规定所发行纸币的价值。例如：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户部尚书马亨批驳外国商人收买钞本平准币值的申请，他说：“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在上之柄，今使一贾得之，废法从私，何以令天下？”^①北宋苏辙在他的《论钱币通用仓库充实之策》中说：“钱币国之所为也，故发而散之于民。”^②明末钱秉澄更讲得坦率：“夫钞止方寸之楮，加以工墨，命百则百，命千则千，而愚民以之为宝，衣食皆取资焉。惟其能上行也。”^③这三个例证，都强调了货币“乃在上之权柄均属于货币国是说”之范畴。清朝王鑒总结了历代纸币流通的历史经验，发展了前人关于“货币国是说”的思想，提出了对当时颇有影响的

无限法偿能力。他说：“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④王鑾推断，凭借国家赋与纸币的这种魔力，就可以使纸币流通无阻，不管国家多少面值，纸币都能够按照已规定的面值流通。他有一段妙论：“且国家之行钞，与富家之出钱票亦异。国家有权势以行之，而富家无权势，故钱票有亏空而行钞无亏空也。百姓信国家之行钞，必万倍于富家之钱票矣。若谓民乐用钱票，反不乐行钞，则是王者之票矣，反不敌一富家之权势，岂有此不通之情理哉！”^⑤这是想当然的主观愿望，实际情况确实是百姓乐用钱票，不乐于行钞。这番妙论完全是抹杀客观事实的。而且，“从来钞法难行而易败，正坐此耳。”（同④）咸丰时，“掌管财政的祁培藻更把这些思想神化了。”他说：“我皇上为天下主，酌盈济虚，铸造宝钞、颁行各省，人人应无不乐从。”^⑥甚至有人宣称：“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⑦“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同②）这种封建帝王可定币值的论调，乍看实属可笑。但这种货币思想却是有代表性的，在封建社会里颇占优势，影响深远，构成了宋元以来发行国家纸币的理论依据，从而形成了这种纸币的封建依附性，突出了它是依靠封建国家权力而存在的性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的：“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承认，而纸币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存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才有效。”所以，当所依靠的国家权力衰弱或不存在时，例如亡国、政权消亡等，所发行的纸币也就行不通而随之消亡（或成为历史文物）。

第二.发行纸币的主导思想是“实归于上，虚责于下”

封建王朝发行国家纸币的主导思想是“实归于上，虚责于下”。这是形成这些国家纸币的封建剥削性的基本因素。古人以金银谷帛为实，钱钞为虚。明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时，就表明了这个意图。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均以严刑峻法强制推行宝钞，三令五申严禁民间使用白银和铜钱。但在行钞过程中，却又自相矛盾。例如，官家征税

或其它征收，就不收或少收宝钞，地方当局各自规定不同的搭成比例或少收宝钞，后来索性规定完粮纳税及各种征收只收白银，不要宝钞。但对官俸军饷及政府开支，严令必须用钞支付。这种国家对宝钞只发出不收进的政策，就是企图用一张毫无价值的纸片来收括民间的金银财货，藉以挽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困难，明朝历代就多次采用此法搜括民财。例如明末崇祯年间，蒋臣订的一套行钞计划，就是用以执行这一意图的，他估计当时民间约有白银两千五百万两，每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五千万，五年为界，用以收尽民间白银，充当发行纸币的钞本来发钞，扩大搜括白银，为崇祯王朝筹款济急。金人和元朝均全力推行不兑现的纸币发行制，把公私金银财宝通通敛集到中央政府手中。金世宗对户部说：“官积钱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不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⑩就是指使其部下把纸币散发出去，用以搜括金银谷帛集于朝廷。即使纸币在流通中发挥作用，又为封建王朝增加财富。清朝在发行咸丰官票时，就规定在“各省当杂各商行生息帑本内，每省酌提十分之三，由该县解交藩库……”^⑪报部核拨，换发官票。以上诸例，均等于唐朝中叶的敛刮民财，以济国用。所以王鑒总结行钞大利之一是：“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⑫尊什么体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在这种发行思想的影响下，甚至把维持纸币信用的钞本（即发行准备金），也变成聚敛财富的手段。初行钞时，反复强调设立钞本的重要性，明令各地把以后国家收入中的白银和铜钱就地储存，以充钞本，并规定必须储存银钱的比例。但是，行之不久，朝廷却将各地储存的钞本，绝大部分集中到中央国库，对有些地区甚至全部提走。这样法定钞本及规定兑现都是一纸空文。所以说，历代封建王朝发行的国家纸币，都是不兑现的。清咸丰朝在发行官票宝钞时就宣称：“银票不是白银，钱钞即是制钱。要恢复钞票与银票兼权并用。”^⑬这就表明官票宝钞就是不兑现纸币。列宁说过：“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公债。”^⑭元朝许衡也指出发钞是政府对人民的负债，说：“此世人所谓神仙指瓦砾为黄金术。……无义为甚。”^⑮这些指责充分揭露了当时纸币的封建剥削性实质。

第三，行钞要害贵在流通，流通的关键则在取信于民

封建统治者也知道，钞法可由上制订；但制订之后，钞券之能否通行，又在于民众之行用。因为：“利源可自上开之，而流之通塞，又不自下权之。”^⑬“但钞即发出，不当使钞自流通之处，钞始非无用之物。”^⑭这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则因为流通才有价值”道理是相同的。即是说，用则通，不用则塞，塞则等于废纸。而通塞之关键，要在取信于民，民信才乐于行钞，否则不可行。自两宋发行交子以后，历代朝野议论行钞者，对此莫不鉴古推今，特予关注。例如，清咸丰帝说过：“总期上下相信，历久无弊。”^⑮在清代胡调元的《行钞策》中也说：“且钞之行用，不须使民相信于平时，始能应急于仓猝”。^⑯至于如何取信于民，很多人都从“收发相均”着眼来具体规划。例如，咸丰初，在筹议行钞时，有人说：“国家欲行钞，则正项杂项俱准银钞兼用，旋发旋收，百姓未有不深信乐从者。”^⑰御史花沙纳在奏呈发行官票章程时明确指出：“钞法之取信于民，全在权衡出入，收放相均，使人贵钞与贵银钱无异，是议发钞并议收钞，尤为现在试行第一关键。”王茂荫把这些论调概括为如下结论：“夫行钞首在收发流通。惟收之宽，斯发之不滞。”^⑱这个结论指出：不先是官司喜于收受，广泛收钞用钞，以此收即以此发，有发不有收，收发不相称，并加强调节，“核定成数，搭收搭放，以期上下一律流通”。^⑲即是说，对纸币的投放与回笼，要及时调节好，过多过少都是有害于民的。如此，则“民信不疑，自可畅易流通。”^⑳这种收发调节的措施有无实效，其症结又在上而不在下。故咸丰批示其臣下，指出钞之，“畅行与否，全视在上信与不信。果能设法预筹，为经久之计，不先自坏成法，断无隔阂之理。”^㉑话是说到点子上，可惜客观存在的事实总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既是权宜之计，又复严法强行，言行不符，隔阂愈深。

封建王朝对它所发行的纸币，特别强调流通，正是点出了这种纸币的封建腐朽性本质。这种纸币既然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它之所以能够流通，只是因为它代替金属货币而流通，在流通中代表着金属货币的价值。这样，纸币的发行数量，必须适合于商品流通中需要的纸币所代表金属货币的数量。如果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超过商品流通的

需要，那么，纸币所代表的单位价值量就减少，纸币就会跌价，物价就要上涨，再发展下去，纸币就行不通。这就是说，不管封建君主如何重法严控，它所发行的国家纸币也不能不受纸币流通规律的制约；它的发行的数量必须受到限制，不得超过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要量。历代封建王朝意识到所发行纸币必须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其目的，明知不能过多发行，却又漫无限制地滥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民间早已习惯于使用钱币，唐宋以后又喜用白银。“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①民间本来就认为金银比较实在，对纸币不免疑虑。“钞本”原以祛疑，“倒钞”（纸币回收）意在因信，官之所为，适得其反。法愈重，民间疑惟愈增；民愈疑，钞愈不行，钞值愈跌，终致废弃。这是封建社会国家纸币的必然结局。

明代邱濬总结了封建社会纸币中发行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国家纸币的实质，是“阴谋窃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并做出结论说：“民间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际。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以其所费之三五钱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亏国用，而至亡乱之祸如无人者，可鉴也已。”^②这就是封建经济下国家纸币的本来面目，它产生于纸币流通手段职能，是本身没有价值的价值符号，而不可能转化为信用货币。

总之，封建经济下的国家纸币，不可能不受到纸币流通规律的制约。从北宋交子到咸丰官票宝钞，其中除顺治钞贯因发行数量少和时间短，又谨慎从事而比较平稳外，其余各代发行的国家纸币都是严重违反纸币流通规律的，这就必然要在流通中导致通货混乱和物价上涨。这种封建社会国家纸币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结局只能是这样。

注释

①元史卷 163 马亨传：参阅续道考。

②历代名臣奏疏。

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第二节第 472 页。

④《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纸币篇》第 1—2 页。

⑤⑥⑦⑧均见王婆：《钱币语言》。

- 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章第三节 322 页。
- ⑦引书同上见 208 页。
- ⑧《金史食货志》。
- ⑨引书同上见 329 页。
- ⑩《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 343 页。
- ⑪引书同上见 328 页。
- ⑫引书同上见 340 页。
- ⑬引书同上见 352 页。
- ⑭引书同上见 384 页。
- ⑮引书同上见 333 页。
- ⑯引书同上见 349 页。
- ⑰引书同上见 331 页。
- ⑱引书同上见 209 页。
- ⑲均见《东华录咸丰 27》。
- ⑳续道考引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 ㉑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676 页《大学衍义补·铜楮之币》。

中国纸币的研究与发展

—在安徽省钱币学会二代会上的学术报告

本会学术顾问 吴筹中

中国纸币可以用十六字概括之，即“历史悠久，浩瀚如海，丰富多采，千姿百态”。

纸币的故乡在中国，宋、金、元、明、清都发行纸币，中国地大人多，疆域辽阔，无处不有纸币，故所谓“历史悠久，浩瀚如海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又有二十多个省区，很多省、市、县都发行和流通过纸币，而且纸币种类繁多，以大类言之，有“中国古钞，清代纸币、外商纸币、辛亥革命纸币、中中交农纸币，军用钞票，各省纸币，商业银行钞票、沦陷区钞票、人民货币”共有十大类，而且各省都不相同，各有它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经济情况等。我分十个大类，是以收藏的实物为主划分的。

我国对纸币的研究，起步较迟，严格地讲，自 1947 年 1 月 1 日开始，即在上海成立中国纸币集藏会，以钱万能为会长，发行第一卷第一期《中币会刊》，该刊发行到 1950 年 1 月结束。此外又发行了《集钞小丛书》二十册，《钞票世界》三期，目前该会的全部刊物，仅上海存有一部。

中国纸币集藏会的刊物，是研究中国纸币的萌芽阶段，1952 年到 1982 年，这三十年是发展阶段，自 1983 年以来，中国钱币学会的季刊《中国钱币》，已发行了四十期，且全国各地有不少钱币刊物出版，如安徽省有《安徽钱币》。

现阶段的特点，是全世界都在收集和研究中国纸币。例如美国史密斯出版了以图录为主的《中国纸币》，此书出版后，其他地区即将《中国纸币》翻版复印后发行，实际上此书的附图（其中不乏珍罕之品）不到全部中国纸币十分之一，却有这么多的翻版和复印，可见中国纸币魅力惊人，潜力无穷。此外，德国的白尔文编辑了以图为主的

《中国纸币目录丛书》现已出版发行了十册；香港钱币研究会发行了会刊七册，还有巨册《世界纸币》等。台北市集币研究协会自1979年5月到1990年11月发行了《集币会刊》十三期；以李振兴为社长，蔡养吾为发行人的《钱币天地》，自1977年1月创刊到1983年11月共发行了四十二期；以陈吉茂为社长，王春起为发行人的《钱坛》，自1984年8月创刊到1986年6月共发行了十二期；以严启文为发行人，严珍珍为社长的《钱币世界》自1990年1月创刊到1991年12月共发行了八期。以上的台北市四种期刊均有大量篇幅研究近代钞票，可见中国纸币的研究和收集已为海内外所重视。上述的台湾刊物，现在都已停办，因为没有经费，也没有人写文章。

一、古代纸币

我国对古纸币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初年；第二阶段为三四十年代；第三阶段为八九十年代。

民国初年有《四朝钞币图录》和《四朝宝钞》，刊印了金代、元代、明代和清代的古纸币，使钱币研究者看到了古纸币实物。

三四十年代发现了北宋钞版和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把古纸币实物的研究推前到北宋和南宋，这是一个飞跃。

八九十年代古纸币研究进入高潮，中国钱币学会出版了《中国古钞图辑》。安徽又发现了“行在榷货务对椿金银见钱关子”试样雕版，该版于1983年在安徽东至县发现，计有行在榷货务对椿金银见钱关子版、准敕版、景定五年颁行版、宝瓶版、行在榷货务金银见钱关子库印、金银见钱关子监造检察之印、榷货务见钱关子合同印（待考）、国用见钱关子印共八块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进行了百家争鸣，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在此，我谈谈对关子版的看法，请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指正。

东至县关子版，有人说是古董商的伪制品，也有人说这是真钞钞版。我认为该版为真迹，非伪品。

第一个理由，依据我所集所见的古钞伪品，有唐代92种、宋代51种、大夏2种、大辽12种、金人3种、元代45种、明代50种、清代2种，共计257种。在这许多古代伪钞中，除南宋行在会子库伪钞版